

运扛挑为业，出卖苦力。随着商业的发展，为货主代办货物中转、装卸、托运等业务的私营运输行业和过塘行应运而生。清朝道光年间，曹娥设立的“陈正和过塘行”至光绪年间成为曹娥31家过塘行的总行。

民国时期，过塘行增多。民国25年（1936年），全县登记在册的过塘行达63家，其中百官大坝头“通运协”，丰惠镇“老通明”、“洽盛”两家过塘行资本均在1000银元以上，各雇有职员3至2人，生意兴隆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各业萧条，货运减少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各业复苏，水陆运输量剧增，复兴和新设的过塘行增至82家。因而在1946年6月2日成立了“上虞县运输商业同业公司”，同年又分别成立“绍兴县曹娥镇脚伙业理事会筹备委员会”，“章镇挑挽业理事会”和“上虞县梁湖坝挑挽业理事会”，全县有“脚班”14个，搬运工人2264人。

从事搬运的人员自己组成“袋头班”，“老酒班”等业务“脚班”，由“脚头”（或称班长）主持搬运业务，分地界承揽过塘货物。当时“脚班”的搬运业务大多须经过塘行承揽推荐，而过塘行从中牟取一定利润。因而，工人累断腰骨，劳动一天所获，除受过塘行的盘剥外，还要受“脚头”的一成克扣，其收入微薄可见一斑。民国末期，坝头费用提取由挑力费的5%提高到15%，搬运工人生活更为艰难。民国30年（1941年），中共党员上海复旦大学学生朱铁晖在百官大坝头组织工人罢工，为增加工资，改善工人待遇开展斗争。

## 五、近代工业及手工业

上虞因经济不发达，故清朝末期至民国时期近代机器生产工业基础十分薄弱，发展缓慢，城镇民众就业者甚少。民国初期，甬绍商绅实力人物来虞创办实业，本地士绅亦合股办厂。但规模一般较小，行业狭窄，只有棉织、电气、碾米、印刷、化工等业，总计不满10家，从业人员不足百人，且随政局变更，市场经济的兴衰，时歇时办，工人谋得一份职业，也是朝不保夕。如棉纺业，民国12年（1923年），小越镇即由旅甬巨商罗仲符创办华通织布厂，历经三载，工厂职工不下百人，扎扎之声，旦夕不辍，可谓兴盛。但好景不长，很快萎缩而倒闭。民国21年（1932年），全县仅有工厂4家，从业人员55人。其中最大一家官商合股经营的“平民工厂”，设备曾有铁机6部，木机12部，雇工40人，年产席法布2040匹，年产值14.4万银元，创办6

年后即于民国23年（1934年）停办。其余如丰惠的“正大”电灯公司，小越“穗耀”电灯碾米厂，章镇“裕丰”电灯公司，百官“江东”发电厂等均属1926年后创办，由民间合股经营，一般每厂雇工5人，计有柴油机4台，蒸汽机1台。除江东发电厂外均属兼营工厂，饱受经济萧条之苦，时歇时办，艰难度日。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全县较具规模的私营企业只有丰惠“利民”碾米厂，“亚光”电厂，上虞“志成”化工厂等21家工业企业。

清末至民国时期，分布在集镇及乡村的五匠（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）及其他手工业者，多属以师带徒传艺，上门串户服务，少数在集镇开店营业。他们虽有一技之长，然从业十分艰难，遇上丰收年景，各业兴旺，经营尚属顺利。但随着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，大批“五匠”艺人与手工业者只得弃艺务农。据记载，清朝康熙年间，全县有五匠艺人551人。民国26年（1937年），有手工业者1.32万人。至民国35年（1946年），手工业者仅存1363人。其中：木匠549人，竹匠645人，泥水匠169人。

## 六、盐 业

上虞县制盐历史悠久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。宋朝熙宁年间曹娥盐场从钱清（绍兴县境）盐场分出。清朝乾隆五年，以曹娥江为界，划分两个盐场。曹娥江东面为金山盐场，场址设上虞县百官镇，是全省25大盐场之一。场管辖区域，自百官沿塘而下，北至海口，向东至余姚盐场，计围延120余里。曹娥江西面为曹娥盐场，场址设会稽县（后改名绍兴县）曹娥镇，自曹娥庙前沿塘而下，北至三江盐场，约80余里。

虞盐的制作方法，最初为煎盐，括泥取卤，设厂立灶，烧柴煎盐。因成本高，盐税重，盐价低，盐民生活艰难。

清嘉庆年间记载，曹娥盐场有煎盐灶2团，16灶，其中贺东团3灶，小金团13灶，锅盘13付，灶丁2256丁（即盐民人数）。至宣统元年仅存贺东盐灶3座，从业盐民384人。

民国21年（1932年），废煎盐为晒盐，生产有所发展。金山盐场配有盐板1.72万块，从业盐工1250余人。民国29年（1940年）盐板增加到3.14万块，从业盐民约2100余人。民国37年（1948年）4月金山盐场，计有盐民400户。盐工2298人，晒盐板3.15万块，年产盐12.3万担，设有盐仓库15座。同年，原属绍兴县的南汇盐场亦有盐工及家属2748人，盐板1.43万块。